

●青●年●读●本●



生命之光

夏衍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生命之光

夏衍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光/夏衍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2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68-0

I. 生…

II. 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21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生命之光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64 千字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968-0/I·502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647

目 录

·人物篇·

永远难忘的教诲	(1)
追念瞿秋白同志	(10)
韬奋精神永留人间	(14)
忆达夫	(18)
忆阿英同志	(25)
绀弩还活着	(31)
赞颂我的“老大姐”	(35)
纪念潘汉年	(38)
杨度同志二三事	(49)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52)
忆健吾 ——《李健吾文集·戏剧卷》代序	(57)
为中国剧坛祝福 ——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	(61)
悼念田汉	(64)
悼秦似	(72)

青年读本

忆孟超	(78)
怀念章锡琛先生	(81)
于伶小论	(87)
小丁今年七十五	
——《丁聪漫画系列》代序	(94)
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	
——悼孙寒冰先生	(96)
不能忘却的纪念	(99)

·回忆篇·

·目

录·

家世·童年	(102)
旧家的火葬	(112)
从“辛亥”到“五四”	(116)
从香港回到上海	(150)
耕耘(节录)	(195)
高墙里的梦	(211)
迟到的春天	(214)
要忧国忧民	(217)
谈经验教训	(220)
关于“谈自己”	(228)
关于笔名	(231)
忆儿时旧梦	(236)
发生命之光	(238)
妥办身后事	(242)

·杂文篇·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244)
《未晚谈》代序·····	(247)
野 草·····	(250)
论“晚娘”作风·····	(252)
从杜鹃想起隋那·····	(254)
宿草颂·····	(256)
甲子谈鼠·····	(258)
论恭维·····	(262)
“废名论”存疑·····	(264)
从点戏说起·····	(266)
一木一石的精神·····	(268)
论肚子问题·····	(271)

·叙事篇·

左翼十年(节选)·····	(277)
“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277)
革命文学论战·····	(289)
筹备组织“左联”·····	(297)
“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305)

青年读本

《文艺新闻》及其他	(319)
进入电影界	(330)
“左联”的后期	(339)
“怪西人”事件	(353)
在大的悲哀里	(360)
郭沫若回国	(363)

·艺文篇·

关于改编	(378)
关于电影	(388)
为电影诊病	(393)
关于剧本	(409)
关于杂文	(420)
关于诗	(426)
关于杂文随笔写作	(428)
关于“论创作”	(434)
关于报告文学	(436)
附：包身工	(437)

·人物篇·

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3月5日,是他九十一岁冥诞。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

从1937年到1966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十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期,我曾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我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55年7月,我到文化部报到前夕,恩来同志约我到西花厅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对我说:电影你干过多年了,我没有太多的意见要说,只希望你团结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电影工作者,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多拍一些好的影片。但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严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

青年读本

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第二是外事工作“授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你开始做外事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对外活动中,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也是终生难忘的教诲。临别的时候,他又说:你先了解一下文化部有没有胜任的翻译力量,要有俄、英、日三种能口译和笔译的人才。在文化部当翻译,单懂生活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懂文化方面的专业用语,假如力量不足,给国务院打报告,尽可能给你们补充。他说,沈部长(雁冰)懂英语,胡愈之副部长懂法语,请你转告他们,假如翻译译错了,或者翻译得不恰当,要立即纠正。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外语,常常因为翻译出差错而闹笑话,这看来像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可是技术性的差错会造成政治上的失误,这一点一定要抓紧。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延伸到外交领域,创建了一种以独立自主为基本立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为目标的,崭新的总体外交政策。他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立足本国,纵观世界,立足今天,展望未来,又不能割断历史,不考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已建交的国家要以政府外交为主,民间外交为辅,对未建交的国家,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一切外交活动既要坚持原则,在适当时机又要当机立

断,灵活运用。

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总体外交政策。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为例。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是国际宪兵。它还纠集了十几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气势汹汹地冲破三八线,直逼我们边境。而我们则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上百孔千疮,百废待举。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应该说我们是被迫应战的,国是弱国,兵是疲兵(一方面又是哀兵)。可是美国军队已经打到鸭绿江边,还在东北投了细菌弹。我们先是提出警告:“不能置之不理”,警告无效,“退避三舍”到了东北边境,那就只能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了。我们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这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可以说这一举是完全出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终于在上甘岭战役之后,把美军赶过三八线,迫使他们要求停战谈判。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同志到板门店去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全面的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我还记得日内瓦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在外事口作过一次报告,会后在少数人的交谈中,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相持不下,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思想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

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建国初期，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1952年帆足计和高良富等来华，开始了民间贸易，但是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时周恩来同志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六十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达六十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但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和影响。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他，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周恩来同志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一旦瓜熟蒂落，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建交的目的。

恩来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顽强地采取反共、反苏和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反华政策，我们被迫“一边倒”了一段时期。当时的政务院和各部都请来了许多苏联顾问，绝大部分顾问也帮助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恩来同志当时指示我们，要尊重外国顾问，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懂业务，不一定了解中国的实际，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要独立自主。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前，总理就对我说，据说文化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国务院的文件等都要先经总顾问的审签，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经验，可以请顾问提意见，但不能由他们做主，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问题。后来中国戏剧学院的一位顾问主张改革京剧，反对脸谱和挂髯口，发生了所谓挂胡子还是贴胡子的

问题,京剧界意见很大,总理知道后就纠正了这种做法。他说,这位专家是搞话剧的,他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来提高我们的话剧水平,我们应该听他的,但他对京剧不了解,不应该让外国的外行来“改造”我们的传统艺术。

1956—1957年文化部接待了许多苏联、东欧各国和日本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演出团队。按惯例,我们总是事先拟好一份接待计划,向总理办公室报告,有时还提出希望总理接见。这是例行公事,我认为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批阅的。可是完全出乎意外,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对我们的接待计划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有时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他要了解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我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如文联各协会)向他当面汇报。记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第一次访华,对于我们上报的接待计划,恩来同志就要我和阳翰笙去谈了两个多小时。恩来同志第一句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略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写一个报告,很轻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他指着那份划了红铅笔和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美术家还是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你们可能也不了解,那么,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孙平化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公一呢?这是1956年的事,对我说来既是受了一次批评,又是受了一次教育。会见过恩来同志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华和丰富的经验之外,也和他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的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恩来同志会

青年读本

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的籍贯、健康、家庭情况,乃至个人的性格和趣味。在会见中岛健藏的时候,廖承志说了一句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周恩来同志就对我说,你不是也欢喜集邮吗,你可以把你的邮集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的。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在田中角荣访华的宴会上,周恩来同志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家乡的民谣,田中感动得几乎流了眼泪。这就是周恩来同志的外交艺术。

50年代中期,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对外宾讲话就常常只讲成绩不讲困难。当时有过一个宣传口径,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恩来同志对一个出国代表团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要你们对外国人讲真话,要谦虚,不要夸大已取得的成绩,更不要讲空话大话。成绩要讲,缺点错误和困难也要讲。中国还很穷,很落后,这一点你们不讲,外国人也会知道,可能他们知道得比我们还要多,所以“不言”就太消极了。一问三不知不行,简单地用“无可奉告”来回答也不对。和外宾谈话一要坦率,二要实事求是,三要沉得住气——就是听到不入耳之言,或者挖苦我们的话也不要生气。文化代表团不同于党政代表团,文化艺术界的对外来往,主要目的是广交朋友,增进理解。他说,我在你们的接待计划或报告中经常看到某某来宾思想进步,对华友好,或者某某来宾思想保守,有反共情绪之类的话,这种非此即彼,不是红的就是白的,不是进步的就是反动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不这样简单,而且是可以变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进步的可以变为进步,对我不友好的可以变成友好;工作做得不好,伤了他们的感情,就是对我们友好的人,也会变得不友好。从总体来看,真正亲华的和真正反华的总是少数,大多数是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想

到中国来看一看的中间派。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外国朋友，增进理解，解除疑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待人以诚，不说空话假话，更不该板起面孔教训别人。

恩来同志还一直教导我们，和外宾打交道，一不要强加于人，二不要把话说死。有一次我们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日程中安排了要在某地“参拜”一个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可是到了那一天，有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于是我们在总结报告中就说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避开，不承认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还对这几个人定性，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军记者”等等。恩来同志看了之后，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先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多数人欢喜的，也可能有少数人不欢喜，这种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像参观万人坑这样的事，除了政治思想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接受得了和接受不了的问题。不去参观万人坑，不讲“谢罪”或者“反省”，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的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比国民党的“拉壮丁”还要厉害，至于作家和新闻记者当随军记者，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能用这个来划线。在战争时期，我们不是强调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吗？这个方针在对外交往中也可以通用。他们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他一再讲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

青年读本

小异,在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有外交了。

恩来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外事活动中,不要一叶障目,看形势不要一成不变。国际形势和外国的政局是经常起变化的,人的思想也会有波动的。天下没有一条笔直的道路,曲折和波动是难免的,要看大局,要看大趋势。把形势估计错了,把话讲死了,那就没有转弯的余地了。60年代初,经过冈崎嘉平太和松村谦三的访华,中日民间贸易有了发展,在恩来同志主持下,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民间综合贸易协定(廖高贸易备忘录)。可是不久,大概是1964年吧,池田内阁为了安抚台湾,发生了所谓“吉田书简”事件,一项早已经日本政府批准了的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的协议被取消,一项造船生产合同也被撕毁。对这件事,连一向被日本人认为“知日派”的廖承志也被激怒了,可是恩来同志却依旧镇定自若。他说,中国建设要从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日本是工业产品出口国,不会也不可能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中日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加上日本财界——特别是中小企业需要和中国做买卖,这是一个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看来免不了要争论、要吵架了,但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窗口堵死,不要把话讲绝。这是高瞻远瞩的预见。事实证明,池田去世之后,出现了亲台的佐藤内阁,但是中日民间贸易这一渠道并没有堵塞,还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以民间促政府,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

“文革”之后,我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协会工作了几年。我遇到的外国朋友,不论是政界、工商界、文化界,凡是和恩来同志有过交往的人,都以一种敬佩之情,众口一词地称赞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有一种崇

高的人格力量和亲切动人的魅力。有一位冈崎嘉平太先生和我谈起初次会见恩来同志的情景。他说：我虽则搞过多年的外贸工作，但对新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我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上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模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惊奇地发现他和日本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机智而又潇洒，我对新中国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当然，有同样感受的外国朋友很多。宇都宫德马说，我和周恩来总理初次见面，谈了几分钟，就觉得他是我的朋友，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森德拉尔也对我说过，要是世界上多几个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那么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至于在美国，敬佩他的人就更多了，斯诺、史沫特莱、索尔兹伯里，还有尼克松、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之前，恩来同志在接见一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一个长发披肩名叫库恩的美国大学生突然袭击：“请问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有什么看法？”这一意外的提问，使美国的领队惊呆了。可是恩来同志却和蔼地对他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为了寻找真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时也试探过各种各样的出路……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觉得不对了，那就会改变的，你说是吗？”这几句话折服了这位年轻人，他友好而诚恳地笑了。

恩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地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他看到了林彪的折戟沉沙，却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新长征的开始，可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格力量，如日月经天，春风拂地，教育和滋润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沿着他走过的足迹而奋勇前进。

1989年

追念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同志在福建长汀就义，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可是他的声音笑貌，他的一言一行，却还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和秋白同志发生工作关系，记得是在1931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可是几次谈话之后，彼此心领神会，就知道他是《赤都心史》的作者了。大家都能回想得起，1931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